

生死链

中国首例核辐射受害者与生命对话

宋学文

著



序



生死链

中国首例核辐射受害者与生命对话

宋学文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链：中国首例核辐射受害者与生命对话/宋学文编.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6
ISBN 7-80180-316-7
I.生… II.宋…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9645 号

生 死 链

作 者	宋学文
责任编辑	陈 佩
责任校对	高小昆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010-63567690 63567691(编辑部) 63567683(发行部)
网 址	edp.ced.com.cn
E - mail	edp@ced.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0-316-7/I·03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何为命运，没人能够说得清，即使你经历过。

如果说死亡是服从了命运的摆布，那么活着就应该说是在与命运抗争。这种抗争是以各种形式一直存在的，或许你并没有留意。命运所给予你的，已知的，未知的，都需要你主动或被动地去面对。或许你不能改变什么，但你也只能去面对，逃是逃不掉的。命运对人最大的诱惑和人对命运最大的疑惑，就是不能去预知它。

我命运的改变与一条小金属链子有关。本来应该是很普通的一条小链子，但就是因为它具有让人闻之色变的“放射”性，它就变成了可怕的物质，具有了特殊的能量，以至于伤害起我来是那么的得心应手，又轻而易举。

当我受到了长时间、大剂量的放射性物质损伤后，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经历了7次大手术，而几乎每一次都是极其残忍地割据我的身体，手指，手臂，右腿，左腿，硬生生地将我由一个健康人，变成了一个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一级残疾人，而这些还不包括这种放射性带来的那些诸多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就这样，我的命运改变了，而这种从我误拾小金属链的那一刻、那一瞬间开始的改变，却要我用一生的时间来面对它。

命运虽是不公的，但生活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痛定思痛，我开始重新审定自己的人生，而需要我做的，我能做的，只有去面对。



残疾,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一方面,它让我失去了太多,包括我的健康、自由、信心和勇气;而另一方面,它也让我得到了美好的爱情,使我已经逐渐枯萎的生命又得到了滋润,并认识了真正的生活,重又树立了自己人生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得到的,要远远多于我所失去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残疾给了我一个自我认识 and 发展的机会。

与健康漂亮、开朗活泼的听子的相识、相知、相爱到相守,我们经历了一个万分坎坷曲折的过程,经受住了种种来自家庭、社会、生活的意想不到的压力、打击与磨难。就在冰与火、爱与恨、苦与乐、成功与失败穿插交错的坎坷生活中,我们最终学会了面对,勇敢地去面对。

目 录

001/序

001/第一章

一条可怕的小链子改变了我的命运

1996年1月5日早晨7:30,我在上班的途中,在地面的薄雪上拾到了一条类似“钥匙链”的小链子,我问身边的人是否丢了钥匙链,都说没丢。因急于去安排工作,就把钥匙链放在右腿膝部裤袋内,准备中午午休时再寻失主。

大概在上午9:30左右,我突然感到头昏恶心,我以为是重感冒。因高空作业,怕出现危险,便回到工地休息室休息。

在短短的两年中,我共做了7次大手术,手术累积时间达30余小时之多,手术缝合300多针,至今已体无完肤,心灵也布满了岁月留下的伤痕;两年中,我先后截去了左前臂,右腿,左腿,就连仅存的右手也每个手指截去了一节,而我却只能亲眼目睹着毒素步步为营地摧残着我的躯体,这比快速死亡要残酷得多,简直能把人逼疯。

071/第二章

我从不敢把自己暴露在窗前

每天除了看报纸外,有时我还会躺在床上欣赏窗口那片小小的天空,有时晴,有时阴,有时阳光明媚,有时阴雨连绵,任何一种天气都会影响我的心情。因为床就放在窗户下,有时我也会趴在窗台上,把身体躲藏在厚厚的窗帘后面,警惕的目光透过玻璃窗,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我从不敢把自己暴露在窗前,对面楼里晃动的人影会让我感到恐惧。尽管那年的夏天很热,但我却从不让母亲敞开门,我怕别人的目光会一不小心溜进来。

一束绽开的鲜花,紧接着就是一张美丽的笑脸。那笑容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何时何地我都记忆犹新。那是一副不掺杂任何表情,完全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亲切的笑容,那感觉既像似曾相识,又像久别重逢,丝毫没有陌生或是尴尬的感觉。这微笑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知道这微笑所带给我的是一种我无法拒绝的友善和我几乎无法解释的一种好心情。整间屋子就像瞬间被笼罩在春光里,一切变得灿烂。

165/第三章

在我的内心里从未退缩过

在不断地到各相关部门上访的同时，我们也曾试着希望得到媒体的有力关注。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买几份报纸，留意一些相关的报道和新闻，只要发现有哪家报纸或杂志关注我这类问题，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寄去一份材料，但寄出去的材料却都杳无音信。

在屡屡遭受挫折的同时，我们的意志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逐渐地学会了坚强地去面对。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办法也得靠自己去想。虽然我曾不止一次地用过“走投无路”、“无路可走”等这些消极的词语，也曾无数次感到心灰和沮丧，但在我内心里却从未退缩过，也从未彻底的放弃过。也许正是因此，在我被生活一次次看似逼上绝路时，那一线新的希望便会在不经意间闪现。

249/第四章

那雪白得可以模糊我的双眼

5年了！我告别这种站立的感觉已经5年了，甚至都有些忘记了怎样站立，但在我心里却从未放弃对站立的渴望。

5年了！我就这样坐在轮椅里，感受着别人随心所欲站立的快乐与幸福，这种快乐与幸福的感觉让我痛苦了1800多个日日夜夜。

5年了！那种矮人半截的感觉现在终于灰飞湮灭了，我可以站得和其他人一样高了，我再也不必降低自己去仰视那些“高人一等”的人了。

5年了！我终于又站起来了！

天黑路滑，昕子在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摔倒了，两条腿跪到了地上，双手却牢牢地扶住了趴在她背上的我。昕子几次试图站起来都没有成功，我也一次次地要求她先把我放到地上，但昕子坚决地说不行，地上太凉，并让我搂住她的身体，然后她腾出了双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昕子已经背着我在满是冰雪的路面上爬出了好几步，我看见她通红的手上沾满了洁白的雪，那雪白得可以模糊我的双眼。就这样，昕子用一双赤裸的双手趟开了一条雪路，爬到了路边，扶着栏杆吃力地站了起来。那一刻——“我有些哽咽。”“我知道被我偷偷吞下的泪有多么滚烫，就如同昕子被冻僵的双手有多么冰冷。”屋子里一时间变得格外的静，仿佛可以听到每个人心房震颤的声音。

285/后记

第一章

一条可怕的小链子改变了我的命运



眼前的一切渐渐地变得模糊,渐渐地变得灰暗,一切都静悄悄的。没有了彷徨,没有了恐惧,也没有了疼痛,身体也变得轻飘飘的。我这是在哪?是不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突然又感到害怕,是因为孤单?是因为无助?还是……迷惘中我在急切地寻找,想找到一种可以依赖的力量。但我却不能,因为我无法挣脱那具沉重的身体对我的束缚,任凭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虚脱得不再挣扎了。

有人叫醒了我,打断了我无谓的挣扎,飘渺不定的灵魂被拽回到现实。被褥都被我的汗水潮湿,让我觉得有些冷。护士拔掉了我手背上输液的针。周围好像有好多人。我只睁了一下眼睛,也没看清什么,就又无力地闭上了。隐约感觉屋子里灯光有些暗,有很多人影在晃动。仿佛听见有人在张罗着给我穿衣服,有人在问担架准备好了吗,有人在问车准备好了吗。我已没有精力去询问他们要做什么,只是在换衣服时,那一阵阵来自右腿钻心的、撕裂般的疼痛会让我稍有清醒,并一次次近似哀求地说:轻点啊!再轻点……

不知自己为什么会这么乏力,也许是因为没休息好吧。昨天晚上住院时,持续了一天的呕吐始终没停,后来又不不停地打嗝。医院根本不具备治疗这种特殊病症的经验以及相关的技术设备,他们能做的只有束手无策。一夜未休息好。今早我不再呕吐了,但那条受辐射最严重的右腿,已经开始红肿、弯曲并伴有疼痛。医生把我由急救室转移到普通病房。这是一间大病房,共有8张病床。医护人员刚安排我住下,便有好心人过来问长问短:小伙子是什么病啊?这腿怎么弄的?是工伤吗?……我告诉他们,是我误拾了一条“钥匙链”,后来领导告诉我,这小链子是公司检测所不小心丢失的,叫“伽玛”源,有很强的放射性。

我的一句话激活了整间病房。大家忽地一下聚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听说这东西可厉害呀！就像原子弹！它有辐射呀！”

“是呀，前些年就有一个工人不小心受了辐射，后来就死了！”

“这么有危害的东西怎么能让它轻易丢失呢？”

“……”

大家越说越气愤：

“让他们给转院！这破医院根本治不了！”

“听说这病得换血，让他们管！不管怎么行？！”

“不管就去告他们，和他们打官司！……”

我静静地听着，他们说的这些我从未听过，也从未想过。想不到我印象中的一条简简单单的小钥匙链竟会带给我这么多后果。什么是辐射？后果到底会怎样？真的会死吗？单位从未做过一次相关的安全教育，哪怕是轻描淡写的一次都没有，我对它的危害更是一无所知。索性我也不去想将要发生的事，确切地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去想。

正说着，有领导来探望，大大小小的领导，表情都很严肃，一会相互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一会又煞有介事地聚到走廊里。紧接着就来了若干人，挤满了病房。他们中有的省卫生厅的，有的是省防疫站的，有的是研究所的……不管是哪的，手里都拿着纸笔在做记录，于是我一遍一遍地向他们讲述事发经过，虽然我是那么疲乏，虽然我是那么疼痛，虽然我是那么不情愿。

1996年1月5日早晨7:30，我在上班的途中，在地面的薄雪上拾到了一条类似“钥匙链”的小链子，我问身边的人是否丢了钥匙链，都说没丢。因急于去安排工作，就把钥匙链放在右腿膝部裤袋内，准备中午午休时再寻失主。

大概在上午9:30左右，我突然感到头昏恶心，我以为是重感冒。因高空作业，怕出现危险，便回到工地休息室休息。

大概上午10点左右，我开始呕吐，并越来越频繁。我先以为是食物中毒，但一想从昨晚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又以为自己患了感冒。中午12点左右，我以重感冒为由向领导请了假，获得批准后坐中午送饭的班车回到单位宿舍休息。

回到宿舍后，我脱掉工作服，把它放在床下箱子里。此时呕吐更加频繁，约每一两分钟就吐一次。由于胃内早已无物可吐，我就大量喝水，然后再吐出。就这样一直折腾到下午5点左右。我整个人都已虚脱了，精神有些恍惚，右腿有麻痛的感觉。我感觉自己实在支持不下去了，艰难地从六楼宿舍爬到五楼值班室求救。

半小时后，金队长来了。问我怎么了，我说自己得了重感冒，吐了一下午了，请求他送我去医院。就在工友替我穿衣服的时候，金队长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我：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工地的?”

“中午,坐送饭的车,我向你请的假呀!”

“那你在工地捡没捡到什么球儿啊或链儿啊之类的东西?”队长一边做着手势,一边有些急切地问。

“啊!我上午在工地捡到了一条钥匙链,还没找到失主。”金队长这么一问,我才想起那条早被我忽略的钥匙链,我以为是金队长丢的呢。

“那链子现在在哪?”队长显得很紧张。

“还在我床底下的工作服口袋里。”

“哎呀!那链子就是研究所昨晚丢的‘伽玛源’!快!马上架着他离开这屋!班长去给经理打电话,说东西找到了!快!”队长十分紧张且焦急地吩咐道。

.....

我不知道自己是被怎样弄到担架上的。只模模糊糊听到有人说:已经晚上11点多了,没有电梯了,走楼梯吧。接着又听到有人在指挥抬担架下楼:前面高点,后面低点,慢点,都看着点……似乎每下一个台阶,右腿都剧烈的痛一下,我就会痛苦地呻吟一声。自己怎么上的车也不记得了,大概是辆面包车吧,我躺在最后一排。不停地颠簸不断地加剧着我的痛苦,我毫无睡意。

“有止痛药吗?给我一片止痛药吧!”我的右腿已经痛得伸不开了,仿佛那条筋在一点一点地被割据、被缩短。

“再挺一挺吧!马上就到了!”说话的是单位的书记。

“要去哪呀?”我痛苦地问道。真希望马上就到那。感觉到那之后我的痛苦就会消失。

“咱们职工医院治不了这种病,领导要给你换个医院。马上就到了,你再挺一挺。”

车里黑漆漆的。我止住了痛苦的呻吟,但并不是我不痛了。我想用手抓紧某件东西,感觉那样会减轻些痛苦。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左手已经红肿了,变得无力不能伸曲,但奇怪的是并没有疼痛感。我已无暇再去顾及它,用右手紧紧抓住坐垫,闭着眼,咬着牙,忍着痛,不吭声,任凭痛出一身身的冷汗。

车开了许久,估计应该到目的地了。一想到这,疼痛似乎又在加剧。我想使自己换个姿势,也许那样会好受些,但我想错了,我已没有力气了,就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且稍微动一动就会带来剧烈的疼痛。我微微地抬起头向车窗外望去。借着窗外微弱的车灯光,我看到一排排树木快速地闪过,车里没有声音,远方也是黑森森的。我开始觉得有些恐怖,很无助。感觉脆弱的自己在与黑暗抗争,在挣扎,在逃离,而那黑暗却是无尽的。

不知道车要开到哪里去,抑或本来就无目的。从时间上算我们离开吉林市已经很远了,他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我知道问了也是白问,索性就不问。目光漫无目的地投向窗外,思绪万千。医院会治好我的病吗?我会死吗?我的腿还能好吗?还有多久才能到?……就这样胡乱的想着,疼痛似乎稍有减轻,不知不觉我又睡着了。

我醒的时候车已经停了。车内依旧黑漆漆的,不知车里坐着几个人,却都没有下车的意思。我挣扎着问:

“这是哪啊?到医院了吗?”

“这呀?这——这是长春机场。咱这医院条件不好,我们坐早晨的飞机去北京。现在才凌晨两点,再等一会天亮了咱就进去,你再睡一会儿……”

从书记的话中我意识到自己伤得很重,但我却没有惊奇。无论我的伤是重是轻,无论能不能治好,也无论是去哪医治,这些我都不去想,没用。我想的只是尽快结束目前的痛苦,但并没有,疼痛依然在加剧。而且我感到口渴,非常非常的渴,仿佛身体里所有的水分都已被榨干,连一滴唾液都没有留下来。我又渴又痛,而我得到的回答却永远只有那一句:再挺一会儿。似乎我所有的要求也只有这么一个答案。

如果用“煎熬”这个词来形容我当时的身心感受,我想一点都不为过。当我终于“挺”过了书记所说的“一会儿”后,已是5个多小时之后的事了。

一进入候机厅我就坐在轮椅上了。因为这时我不但全身乏力,而且我的右腿膝部已经变得肿胀并且弯曲了,已经不能行动自如了。我曾试着将腿伸直,但那钻心的疼痛让我不得不放弃,仿佛那条腿从来就没有伸直过。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坐轮椅,不用自己走,想去哪就让人推去哪,感觉挺新鲜的。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以后那么长的一段日子里,都是轮椅与我共度过的。

第一次坐飞机,新鲜感完全被疼痛感所替代。也没有激动,只是坐在那儿不敢动,因为怕疼。自从坐下后右腿就麻了,我就保持着这个姿势不动,麻木总比疼痛好受点。我把头靠在窗户上,外面天气很好,少云。我把目光漫无目的地洒下去,有城市、山川、河流、公路,好像还看到了长城,无论什么,似乎都激不起我的好奇心和注意力,我实在没有精力去顾及其他,我只盼早点到北京,我感觉自己实在不能再挺了。北京,这个曾经令我向往的地方,没想到第一次来竟是为了治病,而且是好是坏,是生是死,前途未卜。

蹦下汽车上飞机,下了飞机再蹦上汽车,就这样,我终于在1996年1月7日下午1点多,“蹦”到了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零七医院急诊室。那一刻,我仿佛全身的精力都已耗尽,被压抑了好久好久的神经突然松懈,疲惫、疼痛、无助,瞬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地向我袭来,将我淹没,不留余地。我瘫坐在急

诊室的椅子上。就在我即将沉没的时候，我使劲地摇了摇头，抓住了些许意识，绝不能让它溜走，我要保持清醒的意识。

有护士迎上来，问是怎么回事，书记马上回答是骨折。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书记当时为什么要撒谎。

“我们医院没有骨科，马上送到别的医院吧！”大概是护士也不忍心看到我痛苦的样子，于是焦急地催促道。

“啊，不是的，这个——我们是从东北吉林来的，是跟你们预约的——就是受辐射的那个病人……”书记终于解释清楚了，护士反而更生气：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们全院都在焦急地等着这个病人……”护士边说边抓起了电话。

不久，大约有10多个人，几乎是用“冲”的速度来到了急诊室，有的穿着笔挺的军装，有的穿着洁白的大褂，有人相互介绍：

“你好，我们是吉林吉化公司的……”

“您好，我是院长，这些都是我们的专家，先把病人送入病房，我们了解一下情况，马上研究抢救方案……”

到底是军人！做事有质有量有速度。

医生取来了轮椅，快速地把我向病房推去。边走边问：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疼！特别疼！能给我点止痛药吗？”我说出了我的请求，一个“由来已久”的请求。

“可以，可以！我们院长和专家组一直都在等你，他们连午饭都没顾得吃。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我被安置在二楼阳面靠窗口的一张病床上，之后医生就急匆匆地走了。我还是渴，喝的水似乎已不再被吸收。我想吃梨，水分特多的那种，特别特别想吃。我便让小唐替我去买几个梨，钱先由他垫付。小唐出去后，偌大的一间病房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落日的余辉透过树梢从窗口照进来，应该是温暖的，美好的，可是我却感觉不到。孤独、无助、迷茫，还有病痛笼罩着我。病床是白的，病房也是白的，就连那束阳光也似乎是惨白而无力的。慢慢地，我感觉到自己在变小，整个空间却在变大，变得更加空旷、阴森、恐怖，甚至毫无生机。我感觉自己像被置于无尽的苍穹，又像是被弃于无底的深渊，飘忽不定，无依无靠。我挣扎，我叫喊，却苍白无力……

似乎有什么声音，我从恍惚中醒来。一位女医生推门进来。

“你叫宋学文是吧？”女医生问。

“嗯!”我用鼻音回答她。我积聚了全身的力气也只够这一声轻哼。

“我是内一科的护士长。来!这是止痛药,你把它含在舌头下面,不能咽。”

我看到了药盒里的那片药,白色的,只有火柴头儿那么大,这么点儿的药怎么能止住我那么巨大的痛苦?!我不禁有些怀疑。

“给我吃两片吧!”我无力地哀求道。

医生看出了我的心思。“这药非常管用的,含一片就足够了。它是有毒易成瘾的,不能多吃。你先把这个含上,一会儿你就会感觉很困,就不会痛了。”

我只好半信半疑地含下了那据说能止痛的小药片。

“现在院长还有一些专家、教授几十个人正在紧张地研究治疗方案。你要有什么事就按床头的铃,我们就会过来的。你先休息一会儿,不要胡思乱想,我们会有办法的。”

护士长说得对,我刚含下那片药不到一分钟,那条折腾了我50多个小时、现在已经弯曲的右腿终于不痛了,我真有点恨它,但我却没有想过如果失去它我会怎样。疲乏加上药力,我沉沉地睡着了。不知何时,小唐把我叫醒,说找了许多地方也没买到梨。我迷迷糊糊地又嗯了一声,这就是北京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没梨。又不知何时,我感觉有人在脱我的衣服。每次碰到我的右腿时,剧烈的疼痛都让我叫出了声。于是有人说:长痛不如短痛,用力一下子脱下来。随着我的一声大叫,我不知自己是昏了还是睡了。又有人扶起我,有人在理我的头发,凉凉的,像是在理光头,我无力地挣扎着,我不愿理光头,为什么要理光我的头发?后来好像还给我量了身高和体重。而那药也真是厉害,我出奇的困,两张眼皮就像两扇厚重的大门,怎么睁也睁不开,记忆也是断断续续的。

有种声音不停地敲击着我的耳膜,让我醒来。我的意识在捕捉这个声音,渐渐地,我听清了,是水滴声,时而大,时而小,时而急,时而缓,像是来自无底深洞的滴水声。每一声都那么刺耳,那么空旷,却又那么遥远。我慢慢地睁开眼睛,黑糊糊的,像是没开灯。意识渐渐清晰了,眼前景物也渐渐清晰:灰白的天棚,吊着一盏灰白的灯,散发着灰白、暗淡的光。一边是白色的墙,一边是玻璃和门,地上放着一只桶,一个穿着奇特服装、只露着眼睛、不知是男是女的人在桶边拧着毛巾,水滴进桶里,清脆而响亮,这就是那个声音的来源。我弄清了自己的位置,我躺在一张带轮子的平板床上。我扭过头看着那个人。

“你醒了!还疼吗?”听声音是个女孩,只是口音有点怪。后来她才告诉我,那是地道正宗纯正的北京口音。

“.....”

“怎么不说话?”她一边小心地给我擦着身体,一边和我说话。我感到莫名其妙。

“.....”

“现在有什么感觉?”

“这药真好使!”我由衷而且深有体会地说。

我被剃光了全身的毛发,洗净每寸肌肤,全身消毒后送入了位于医院五楼的洁净病房。那个护士告诉我:这是医生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因为我的病极其特殊,又怕感染,又怕出血。洁净病房里是一个细菌都没有的,所以也叫无菌室。它原本是专供治疗毫无抵抗力的白血病患者的,是最好的病房,也是管理最严、价格最贵的病房。

也许是那药的余力还没过,我并不感到很痛,人也显得有几分活力,于是便开始打量周围的环境。我眼中的洁净病房是一间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一张洁白的床,对面有台电视,电视上面有台监控器。左侧全是玻璃窗,一扇玻璃门,外边就是我才消毒的走廊,走廊对面便是医生办公室和护士站。床的右边放着一辆急救推车,上面摆着急救用品。再往右便又是一大扇玻璃窗,透过玻璃窗外空荡荡的走廊,便可以看到外面了。无菌室,一间近似透明的小屋。

刚熟悉完屋内的环境,便有人来,依旧穿着浅绿色的怪衣服,帽子、口罩、手套、袜套,只剩两只眼睛露在外面。先是与身边的一个护士小声嘀咕了几句,紧接着转向我,声音也提高了好几度,爽朗,清脆。

“怎么样了,小伙子?不疼了吧?剃了光头比原来精神多了,还不让剃呢!你知道吗,你还没来我们整个医院就忙上了,为了集中力量,我们这科都不收病人了,10间病房就住你一个人!到现在院长和那些专家们还在开会,分配任务和制定紧急救治方案,都两顿饭没吃了。哎呀,多漂亮的小伙子!像人妖似的,你说你没事捡那破东西干吗?那东西怎么能丢呢?你今年多大了?”

终于给我说话的机会了。

“快20了,还有——几个月就过生日了。”我想了想说。

“还挺年轻嘛!得了,你以后就叫我‘大妈’吧!我也是东北的,我姓王,是这科的护士长。我嗓门大,但我讲理!一会儿会有医生来,给你做个小手术,打麻药,一点都不疼,别紧张,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身体哪不舒服也及时跟我们说,一定要配合我们的治疗!”一接触,我便发现她是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型的人。

我点了点头。

“知道这是谁吗?”大妈指着旁边的护士问我。

我上下左右看了她一遍,摇了摇头:

“不认识.....”

“嗨!我不就是刚才给你消毒的那个小季嘛!”

护士走后不久,来了一高一矮同样穿着的两个医生,于是,我的第一次手术便开始了。手术的目的就是在锁骨处插一根输液管,这样以后输液就不用再重新扎针,极大程度避免了因输液引起的感染。医生开始给我打麻药,当手术刀割开我的皮肉时,我听到了滋滋声,是那么的刺耳,那么的恐怖。我不知自己是紧张还是害怕,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而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手术,仅仅才是个开始。

夜幕开始降临。在它完全笼罩一切之前,我的目光穿过了大玻璃窗,投向了远方。所谓的远方不过是窗外的另一座楼而已。它矗立在夜色中,虽不高大,但却威严,像座城堡。楼的顶部有一大束天线,那形状就像一棵落光了叶子的秃树,而每根树枝都像一把利剑,似要刺破夜幕,与黑暗相抗争。远处飞来了一群乌鸦,一大群,落在那棵秃树上,那树就像突然长出了许多黑色的大叶子,二者的命运好像被连在了一起。稍作休息后,有的便拍打着翅膀飞向家的方向。于是便想起了那首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起风了,好像还很大,便有乌鸦迎风飞起,但那风却吹得它飘忽不定。凛冽的风撕扯着它凄厉的叫声,任凭它拼命地拍着翅膀,任凭它一次次努力的尝试改变命运。夜色更浓,淹没了抗争的利剑;风也更大,吹散了归家的乌鸦……

有医生急匆匆地跑来问我家庭详细地址,我一愣,全身每根神经都瞬间紧张起来,戒备着。为什么?医生说是病情需要,必须通知家人。我不愿去惊动家人,更不愿家人看到我这样子而伤心。可我又别无选择,我很不情愿地说出了家的地址。家,那是一种多么温暖的感觉,一种多么欣慰的感觉啊!而现在,我却离家千里之遥,形单影只,无奈无助。模模糊糊中,一种想家的感觉油然而生。

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虽很偏僻,却不闭塞。这就是我的家乡,一座远离都市喧嚣的小山村。15岁时我就离开家去外地读书,之后又去上班。我在不断地接受着新事物,不断的变化着,而家乡却依旧用纯朴、热情、温暖的怀抱迎接我的每次归来。而现在,那条弯曲而泥泞的乡间土路,还有那袅袅升起的炊烟,都变成了我思乡的缕缕情思。

那时,我每隔一两个月就回一次家,当双脚一踏上家乡的土地时,那种愉悦的心情是无法言喻的。因为交通不便利,有时我只能在家住一个晚上。但每次回家,无论时间有多紧,我都要去看望奶奶,奶奶就住在隔壁的三叔家。从小奶奶就非常疼我,每次我都陪奶奶聊很长时间,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奶奶上了年纪,耳朵有些聋了,前几年又得了老年性白内障失明了,但这却丝毫不影响我和奶奶的交流。我每次来到奶奶跟前,只要把手递给奶奶,奶奶一摸就能亲切地叫出我的乳名来,我也不用大声说话,奶奶却听得一句不落。奶奶除了讲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每次还都给我讲大爷年轻上学时,因为轻信别人而被骗了财物的

事,嘱咐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每次我都认真地听,从不觉得唠叨,奶奶是善良的。每次我要走的时候,奶奶便摸索着拿出她珍藏了许久的糕点和糖果,不容拒绝地塞满我的每一个口袋。这些糖果是奶奶每逢年节时攒下的,虽然有些已经发霉,但我从未嫌弃过,这是奶奶最好、最珍贵的礼物。最后还不忘问我下次回来的日期,之后便默默地数着、盼着。

最近的一次回家是1995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我受伤之前一个星期,适逢元旦假期。那天特别冷,但心情特别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爬行,而心似乎早已飞回了家。车到站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下车的,接站的,挤满了不大的车站。借着车内微弱的灯光,透过攒动的人头,我一眼看到了接站的父亲。

父亲站在车门对面的一个雪堆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从车里下来的每一个人,生怕错过一张面孔。天气异常的寒冷,父亲微缩着身体,双手插在衣袖里,两只脚不停地互相磕着来抵御寒冷,而眉毛和发梢上早已挂上了厚厚的一层白霜。

“爸!”我叫着跑了过去,心里暖呼呼的。

一看到我,父亲冻僵的脸上立刻露出欣慰的笑容。

“差点儿没认出来你!天这么冷,你怎么穿这么少?!”父亲关心地问。

“里面穿着厚毛衣呢!市里那边并不冷。”

“我赶了牛车来,就在那边!路挺滑,小心点儿!”父亲一手接过了我的背包,一手搀扶着我的胳膊。我能感觉到父亲的手是那么有力,那么温暖。

“这次能在家呆几天?”这是父亲最关心的话题。

“两天!我三号就得回去上班,那边工作挺忙。”

“正好明天元旦,明早杀年猪。”父亲显得特别高兴。

“爸!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我估计着你这几天能回来,连接了两天没接着,我猜你今天应该回来了!”听着父亲的话,那一幕幕仿佛便呈现在眼前:父亲终于在焦急和寒冷中盼来了客车,满怀希望地看着每一个从车上下来的人,直到最后依然没看到我。于是父亲只有一个人赶着牛车,带着失望的心情,默默地向家走去……每想到这,我便有种想哭的感觉。父亲是个老实人,平日里话也不多,但父亲却把他对家庭和子女的关心与爱,完全融到默默的行动中。

从车站到家还有近十里的路程。我和父亲借着月色,坐着牛车往家赶去,每到转弯处,父亲都要亲自下车去吆喝着牛走正路,却不让我下车,父亲说地上滑。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聊,我告诉父亲我在单位工作很顺心,领导对我也很好,厂庆时我写的文章还得了二等奖呢!而对于我从事的高空作业工作的危险性,我是从不跟家人说的,我怕他们为我担心。父亲没多说什么,但我能感觉父亲心里有一份幸福和欣慰。从父亲的话里我也知道奶奶身体很好,母亲时常挂念我,妹妹学